

从独立到自主:近代中国民主化的基本逻辑进路

唐忠宝, 刘焕明

(江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独立自主是一个国家实现民主的历史与逻辑前提。通过经济独立,以公有制“争得民主”,以国有经济保障独立自主,以民生促进民主,民主获得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政治独立,摆脱外部势力的干涉和依附政治的局面,将民主建设与法治建设统一起来;通过思想独立,建构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话语体系。

[关键词] 独立自主; 民主; 建构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8)06-0037-07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的运动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一度把目光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借鉴西方民主和自由的理论,在中国先后发起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试图在中国建立起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而,这条路最终失败了。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显然不能忽视:西方列强不愿意看到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如果不能实现民族的真正独立自主,那么,国富民强、人民当家做主也就无从谈起。换句话说,只有实现了真正的民族独立,才能够实现真正的人民幸福。

考察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披着民主外衣的资本主义列强,一面扩展自己的殖民范围,一面推销着西式民主。其结果是,后发型国家由于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自然无法实现真正的民主。

一、经济独立是实现民主的前提

人们通常认为,民主与经济之间似乎并没有太紧密的联系。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说,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但福山同时又承认,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其原有的民主认识框架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中国。^{[1]56}的确,不管西方人愿不愿意,中国的崛起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这种崛起,在经济上

体现得最为明显。2012年畅销书《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对此有过详尽的数据说明:“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中,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2009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000多美元,两亿人口脱离了贫困线,积累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2010年,在经济总量上,中国首次超过了世界经济强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惊呼中国创造出了经济发展的‘中国速度’,美国《时代》周刊形容这是‘一个新王朝的开始’。”^[2]中国近年来的高速发展,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国。

那么,民主政治建设,到底和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对其民主政治建设产生影响呢?

顾名思义,民主的字面意思即人民当家作主,而要真正做到让人民当家做主,仅有民主建设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推进民生建设。改善民生是民主建设的重要前提,尽管“民主建设”更侧重政治视角,“民生建设”更侧重经济视角。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经济独立是实现民主的重要前提。通过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人民能够实现自我管理和自我治理;而通过推进民生建设,人民可以实现自立自强。

(一)以公有制“争得民主”

以经济的方式来获得民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

[收稿日期] 2018-07-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基金项目(16CKS040),江苏省社科基金专项(14SZB008)。

[作者简介] 唐忠宝(1983—),男,黑龙江呼兰人,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价值哲学研究。

刘焕明(1962—),男,黑龙江绥化人,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等问题研究。

经典作家曾有过经典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明确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3]52}通过政治统治的手段,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了社会的全部资本;而要实现增加社会生产力的目标,无产阶级就必须采取强制手段改变所有权以及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这里面实际上包含着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传统生产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根本一致性的前提下开展的,而现代化生产则将上述二者分离。也就是说,现代生产与传统生产的根本区别在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现代生产的这种分离导致了物“反客为主”,实现了对人的统治,实际上也就是资本对人的压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还以“物的依赖”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

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来看,个体的自主与独立固然是现代民主发展的基础,但人与物的分离以及由此产生的物对人的统治,即资本对人的统治,使得独立个体在经济与社会中的自主性很快就在异化劳动中消失殆尽;与此相应,以个体自由发展为取向的现代民主也就失去了本质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改变人与物的关系,结束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局面,使劳动者作为社会力量整体占有生产资料,只有这样,个体的独立和自由才能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中获得实现的基础。^[4]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进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的民主与民生是无法直接从人民出发的,都只能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一种形式。只有将统治阶级的生产资料归还到人民手中,以全社会集体占有的方式组织生产,才能真正结束物对人的统治,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统治者和治理者。从这个逻辑出发,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进行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造,其目的正是要在经济和政治双重维度解放广大人民。简言之,以民生,促民主。由此可见,公有制是人民民主最基本、最关键的经济基础;失去了这个经济基础,人民民主就荡然无存。

(二)以国有经济保障独立自主

当前,一些人依据新自由主义的时髦原理,致力于改变中国的所有制结构,搞垮中国的国有经济,他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以“反垄断”的名义来误导群众、蛊惑人心,进而让人们敌视、削弱国企,以“权贵资本主义”的罪名来羞辱国有经济,声讨国有企业。众所周知,所谓垄断即指在资本主义

发展过程中,通过“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恃强凌弱、弱肉强食的过程。资本主义的生产从自由竞争过渡到集中,集中到一定程度即为垄断。然而,反观中国的国有经济,其演变历程则有着根本的差异。至少从发生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国有经济并未经历从自由竞争到集中、再到垄断的过程。显然,指控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垄断企业、垄断行业,缺少根据。

很多人之所以妖魔化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因为他们认为国企效率普遍低下,目前处于生存困境之中;即便有个别国有企业效率高,也是因为沾了垄断的光和权贵的光。事实果真如此吗?考察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国企出现困境是在改革进程中过度市场化、私有化导致的。必须看到,国企和私企的价值目标存在着根本的差异,相应地,二者也面对着不同的税收政策和市场竞争境遇。国企必须将大部分利润义务地上缴给国家,这一政策必然导致其在与私企的竞争中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再加上国企的负担超重,前有老职工,后有小社会,被捆绑着的一条大虫,如何能够像小泥鳅一样灵活?但是,只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一旦形成,国企的活力一样会尽得显现。西方经济学一味地强调“明晰产权一抓就灵”,流行的抓大放小企业改制,厂长持大股,产权是明晰了,职工的主人公主体地位却不清晰了。如果你是职工,你会有积极性吗?大家没有积极性,企业能搞好吗?更要命的是,借着改制的机会,那些真正亏损的国企无人问津,那些效益好的、职工尚可吃饭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先被厂长们、地方豪绅们“明晰”了。^[5]简言之,有人把国企妖魔化的目的是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必然导致国家经济无法真正实现独立自主。

国有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

(三)以民生促进民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式民主的一个重要区别还在于,中国的人民民主一方面要在“集体”意义上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还要在“个体”意义上追求每个社会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价值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逻辑起点,也是最终归宿。

从人民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需求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应该“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财产”,从而改变其所有制的社会性质,使其失去“它的阶级性”;与此同时,从促进和保障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出发,马克思恩格斯

认为公有制并不意味着“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相反,要保障个人财产,并使其能够自主而平等地发挥作用。^{[3]46}

基于这一逻辑思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在坚持公有制的基础上,大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显然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的。这一经济举措也为中国的人民民主理论提供了客观上的保障。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价值取向背后的政策动机是双重的:一是让人民民主在中国得以确立和巩固;二是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而幸福的生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其他党派是参政党。其民主政治建设的思路不是西方的分权模式,而是一种体现人民主权的模式。其中,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繁荣稳定,是保障人民主权的重要前提。因为,只有实现经济和政治的良性互动,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实现的人民民主是一种全面的民主,其不仅要求实现政治上的民主权利,而且要求实现人民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方面的民主权利。从国家制定政策和规划来看,中国共产党能够不受党派竞争、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并竭力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与党风廉政建设之间的关系。

与西方各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可以制定国家长远规划,并保持政策的长期稳定,不会受到政党更替的影响,而不同政党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往往相左。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是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政治民主化的客观保障。毕竟,过于频繁的政策摇摆,无疑会对社会经济的稳定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有时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只有立足民生,实现经济与政治的良性互动,方能从根本上推进中国特色民主化的进程。

二、政治独立是实现民主的保障

回顾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不难发现,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经历了一段极其艰辛的苦难历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独立,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探索,为中华民族崛起和中国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提供了客观上的保障。

(一)争取独立自主的艰难探索

自近代以降,很多志士仁人都满怀热忱,试图在中国实践民主。先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救国出路,试图变法维新,实

行君主立宪制度,结果以失败告终。紧接着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政府,历史自此进入中华民国时代。客观地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于推翻了在中国存在了上千年的封建专制,因而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必须看到,中国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已经决定了帝国主义列强是不允许中国学习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强国之路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孙中山的继承者们,非但没有进一步推进民主的步伐,反而愈加专制和独裁,旧中国的人民苦不堪言,民不聊生,民主进程一度出现了倒退。

自此,完成救亡图存任务、实现国家政治独立的任务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6]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正掌握到了最先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是将先进的理论与先进的阶级结合起来,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有了思想武器、阶级基础和政党领导。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来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由理论到实践的历史。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革命道路,就是一条全心全意依靠人民并真正为实现人民根本利益而奋斗的人民民主之路。

尽管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我们总是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外力干涉,但我们依然能够做到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在同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世敦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处处威胁中国,但“原子弹吓不倒中国人民”,“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7]同年7月14日,在同两位拉丁美洲人士谈话中,毛泽东更是提出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他号召广大亚非拉国家人民,要努力争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使人民不再受压迫,真正实现当家做主。

(二)依附政治导致的民主失败

按照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考察,人类迄今为止经历了三次民主化的浪潮,同时也经历了两次民主化回潮,而这两次民主化的回潮就是多国民主体先后集中崩溃的时期。^[8]亨廷顿把民主化浪潮和回潮的大致时段总结如下: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开始于1828年,到1926年终止;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开始于

1943年,到1962年终止;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开始于1975年,目前总体还在进行当中。

两次民主化回潮的时间分别是:第一次,1922年到1942年;第二次,1958年到1975年。亨廷顿认为,第一次民主化回潮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新兴的民主国家,很多都在随后的艰难时世中遭遇了重大危机。第二次民主化回潮,似乎有点出人意料。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政治学界起初对摆脱了战争阴影或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持有非常乐观的预期,但是随后的事实,让很多研究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发展的学者们大跌眼镜。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很多拉美、亚洲、非洲国家开始纷纷向威权转型。据统计,从1962年的秘鲁开始,到1973年的智利,几乎所有重要国家都发生了民主崩溃。在亚洲,巴基斯坦、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新兴国家的民主政体也很快崩溃了。在非洲,除了博茨瓦纳一个国家,凡是在1956年到1970年间独立的国家并建立民主政体的,不久之后,全部变成了威权国家,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

由此可见,前两次民主化浪潮之后,均出现了民主化的回潮。那么,1974年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否也会伴随着民主化的回潮呢?亨廷顿认为是完全有可能的。1974年至2006年间,全球总共发生了20次左右民主政体的崩溃,而且自2000年之后,新兴民主国家出现民主崩溃的概率正逐年增加。

为什么会出现民主化的回潮呢?或者说,为什么民主政体建立后,又发生了崩溃呢?据学者包刚升的考察,已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视角进行:第一,贫富差距的激烈冲突容易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第二,经济原因,这种解释把经济发展、经济稳定或经济绩效作为主要变量;第三,涉及到民主国家内部的社会分裂。^[9]客观说来,上述学者的研究和分析基本上能够解释民主政体何以崩溃,但如果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实际上,其崩溃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根本的原因,即政治独立的因素。

纵观这三次民主化浪潮,基本上都与经济全球化息息相关,而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背后,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以及半边缘国家的控制,或者说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对中心国家的依附,越发增强。这种依附不仅表现为经济依附,同时也表现为政治依附,甚至表现为社会心理的依附。试想,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政治上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那么,其民主政治的建立以及稳定,就很成问题。非洲的

尼日利亚的民主政体之所以崩溃,固然有族群冲突、选民分裂等因素,但其长期被殖民导致的经济依附和政治依附,才是其民主政治无法持久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拉丁美洲的智利,之所以出现严重的阶级冲突,进而导致民主政体失败,显然也与其长期被殖民(过于依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关。至于亚洲的印度、菲律宾,其道理更是如此。

显然,作为后发型的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建立现代化的民主政体,就必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独立。难怪美国学者福山近些年来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大有否定掉其“历史终结论”之意,而大谈特谈“强势政府”对于后发型国家实现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福山所说的“强势政府”,实际上就是要求后发型国家摆脱对发达国家或所谓“中心国家”的依附或依赖。

以我国的台湾地区为例,台湾曾经是“亚洲四小龙”,但其经济类型属于典型的“依附型经济”,至今依然如此。台湾经济上的不独立,也直接导致其政治上处于对美国 and 日本的依附地位。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实正是这种“政治依附性”与“岛民性格”对台湾民主政治造成许多乱象,形成了瓶颈制约。

除了对美国的依附之外,台湾对日本的依附更是十分明显。由于台湾之于日本的重要地位,几十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对台湾的种种攻势。而台湾岛内的一些台独分子,也趁机心领神会地依靠和依附日本,甚至把日本作为其大本营、大后方。

关于台湾对日本的依附,还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原因。众所周知,自1895年之后,台湾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可以说,日本对台湾50多年的殖民统治,一方面在战后使日本右翼势力的内心深处滋生出浓厚的“台湾情结”;另一方面,也在台湾岛内豢养出一批满脑子“皇民意识”和具有浓厚“日本情结”的台独分子。^[10]换句话说,台湾地区的民主政治特征,与其他一些后发型国家有着本质上的共同之处,即历史上的被殖民,导致现如今处于依附地位。进一步说,政治上的依附性,即政治上未能完全独立自主,自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看看台湾当下民主政治的各种乱象(族群对立严重、国家认同危机、公民文化不足等等),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三)民主与法治的统一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自此,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由此进入到了全新的时代。十年“文革”期间,民主法治遭到破坏,反思这段历史,邓小平同

志曾意味深长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1]158}新时期，在大力发展经济、恢复国民生产的同时，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那么，新时期到底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呢？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11]176}邓小平在此不仅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民主问题的重要意义，同时将社会主义民主理解为“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实际上也是对国家独立之于民主建设重要作用的强调。

三、思想独立是实现民主的灵魂

所谓思想独立即是说，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掌握自己的话语权；体现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即要求不能完全迷信西方民主的话语。须知，民主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西式民主不是民主的唯一模式；要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框架中，着重突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模式和理论。要想使中国的民主道路或中国的民主模式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就必须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保持自身思想、体系、学说的独立性。

（一）民主话语的两种落差

说到民主，在当下中国的思想界可谓是一个时髦的范畴。但究竟如何看待民主，不同人的理解可谓大相径庭。学者杨光斌将中国思想界对民主的认识，概括为两种落差，叫“一高一低，一多一少”：民主观念的普及度非常高，民主制度的实施度相对较低；民主的口号非常多，民主理论研究非常少。^[12]

一方面，在民主理论与民主实践之间，存在着世界性的普遍主义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之间的张力。在中国，说到民主，似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民主的认识。可以说，“民主”的理论和观念在中国的知名度和普及度很高。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是，如果进一步追问人们心目中的民主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很多人的理

解则过于简单甚至片面。有人说，民主就是一人一票；有人则认为，中国的民主不应该照搬他国模式，而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但独特的中国民主模式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

对民主概念的澄清，将有助于中国执政者、学者以及民众增强自信。在这方面，国外一些学者倒是较为客观公正。哈佛大学的托尼·赛奇教授就曾经指出：“我想强调，中国不能照搬别国的制度模式。每一个国家应找到他们自己的路。中国的民主和美国的民主不一样，与日本的民主也不一样。这些都是在各国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如果看中国的未来，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传统。……中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中都有很多好的治理方法，要学习过去的一些经验。学美国没什么意思，……学美国的政治体制，我觉得不是特别有意思，因为中国得找到自己的道路。”^{[1]155-156}不难看出，对于现在的中国民主进程而言，当务之急是总结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历史经验，尽快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实质内容的民主话语。

（二）建构民主的中国话语

中国在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不断的争议和质疑，即西方人在话语权上对我们的高压攻势。如何建构强势的中国话语，实现思想独立，也是中国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谐、和平的民族，中国共产党人多年来也一直采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遗憾的是，尽管新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还是有一些西方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他们总是习惯性地发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人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何陷入停滞？中国何时能够从一个威权国家变成民主国家？如此等等。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似乎忽略了很多客观事实：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是综合实力提高最快的国家之一，是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国家之一，等等。张维为教授对此有过经典的评论：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媒体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负面报道，背后是许多西方人盲目的政治自信，是“历史终结论”的影子还在作怪，所以我们要点破西方话语，要解构西方话语，要指出这种话语的不智和荒谬之处，同时我们还要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把中国的事情说清楚，对国人说清楚，对世界说清楚。^{[13]131-132}

200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在访问墨西哥时，曾经对西方的话语霸权有过精辟而有力的回击：“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

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14] 习近平同志的这段精彩论断,再一次昭示我们的外交方针:既要“韬光养晦”,同时还要“有所作为”。

今天中国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老二”,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然而,“世界老二”不好当。美国已经扳倒了两个“世界老二”,先是苏联,后是日本。前者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后者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是接轨的,但美国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自己变成“世界老二”,它很害怕失去“世界老大”的位置。从这些年美国的各种战略部署来看,它已经加紧了对中国的各种“制衡”。随着中美硬实力差距的缩小,它已经越来越多地使用软实力来牵制和阻碍中国的崛起。

1. 内部制衡和话语制衡

按照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的观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目前在民主话语方面,采取两种制衡的办法应对中国的崛起,即“内部制衡”和“话语制衡”。所谓“内部制衡”就是通过在中國培养一批异见分子来直接对抗中国的主流话语,这其中包括“藏独”、“疆独”、“台独”、“港独”等势力,以及各类亲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等。而所谓“话语制衡”,就是通过舆论的攻势,以西方的民主、宪政理论为武器开展各种攻势,达到瓦解中国人心的目的。^{[13]132-133} 美国的政治文化中没有“与人为善”的观念,只要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与人为恶”将是常态。在美国硬实力持续下降的同时,美国加强了软实力的攻势,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和认识,绝不能以自己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来代替坚定有力的反制措施。

客观看来,目前美国的这种“内部制衡”和“话语制衡”的策略已经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尽管中国在很多硬实力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一些受到西方话语影响的中国人,却始终没有停止发出唱衰中国的声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当多的中国知识界人士和媒体界人士处处以美国模式马首是瞻。这种对美国模式的顶礼膜拜使他们敌视和诋毁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对于中国存在的问题,他们要上纲上线,一切都是制度问题,最好是拆了“故宫”建“白宫”。他们硬是把一个世界上崛起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国家描述得一片漆黑,这不公道,当然也不得人心。对于美国和西方存在的大量问题,他们则帮着文过饰非。

2. 从解决“挨饿”、“挨打”到解决“挨骂”

自近代以来,中国竟有长达一个世纪的时期任

人宰割,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真正实现了独立自主,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解决了“挨饿”和“挨打”的问题。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如今的中国,尽管硬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软实力的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尤其是在话语权建设方面,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时不时就会被西方国家拿来批判一番。中华民族要想真正崛起,离不开软实力的建设,离不开话语权的建设。换句话说,没有话语权是无法真正崛起的,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即使是自己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作是做错的,或者是过渡阶段的,最终要转到西方模式,尽管西方模式早已处在重重危机之中。可以将中国当前的这种软硬实力之间的矛盾,比作“挨饿”、“挨打”与“挨骂”之间的矛盾。解决了“挨饿”和“挨打”的硬实力的问题之后,必须抓准时机,迎头赶上,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来。尤其在民主建设方面,我们决不能一味地囿于西方式民主的框架,以一种所谓“普世价值”的眼光来推进中国的民主建设。须知,每个国家的历史不同、国情不同,文化特征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显然无法直接照抄照搬。西方式民主的优势,我们当然要学习,但其弊端我们也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话语权建设方面占据主动地位,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理论上的指引。

3.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民主理念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当然也付出过较为惨痛的代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政治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对其长期性和艰巨性有着充分的认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当务之急是尽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民主理念。

客观看来,当前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有一些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从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到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的经典论述;从江泽民同志时期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理论升华和概括总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作了深入、细致的阐释。2014年9月21日,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同志着重谈到了社会主义推进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

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

不难看出,民主理念的发展不应该是从理论到理论,而应当是从实践到理论。中国发展取得的成绩,不仅表明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同时也表明,民主政治模式的发展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实践和发展,但并不意味着要采取“原教旨主义”的方式彻底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早就被毛泽东所批判过;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充分借鉴西方式民主的成功经验,但借鉴不等于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既有合理性,也存在着诸多弊端,这就要求中国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必须正视其不足,并结合本国实际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

实践表明,中国不应该也没必要做西方话语的“传声筒”,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模式日益显现出巨大优势,如中国共产党代表群体的广泛性、出色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机制,以及能够制定国家发展的长期规划等。中国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在党,推进“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是根本,此外还应加强法治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正如中国的经济崛起一样,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实践要想更进一步,就离不开自身民主话语的构建。

[参 考 文 献]

- [1] 谷棣,谢戎彬.我们误判了中国——西方政要智囊重构对华认知[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
- [2] 谢春涛.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96.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论中国民主》编写组.论中国民主[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296.
- [5] 司马南.民主胡同40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242—243.
-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36.
- [8] 萨缪尔·亨廷顿.第三波[M].刘军宁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11—26.
- [9] 包刚升.民主崩溃的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0—24.
- [10] 汪谢.台湾民主政治透视[M].北京:华艺出版社,2014:57.
- [1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2] 杨光斌.让民主归位[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
- [13] 张维为.中国超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 [14] 原声视频.习近平痛批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指手画脚[EB/OL]. (2009—02—13)[2018—05—12]. <http://www.szhgh.com/Article/news/leaders/12833.html>

(责任编辑:程晓芝)

From Independence to Autonomy: The Basic Logic Approach to Democratization in Modern China

TANG Zhong-bao, LIU Huan-ming

(School of Marxism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Abstract: Independence is the historical and logical prerequisite for a country to realize democracy. Through economic independence, democracy is “won” by public ownership, independence is guaranteed by state-owned economy, and democracy is promoted by people’s livelihood. Therefore, via economic independence, the democracy of China has obtained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Through political independence, the country gets rid of the interference of external forces and the situation of dependent politics, and unifies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legal system; by means of ideological independence, the country construct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Democracy; Construction